



拉法格文选

拉法格文选

下 卷

中共中央马列思
恩格斯大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负责本书编辑和校订工作的是李兴耕、陈双
苑、殷叙彝。负责技术规格和人名、报刊索引的是
费新录。

拉 法 格 文 选

LAFAGE WENXUAN

下 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319,000 字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书号 3001·1971 定价 2.55 元

目 录

法国的阶级斗争	1
(1894年8月)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49
——回答让·饶勒斯	
(1895年1月10日)	
财产的起源和进化(摘录)	72
(1895年)	
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	151
(1896年12月)	
交易所的经济职能	177
(1897年2月)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巴黎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9
(1899年12月)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	207
(1900年2月25日)	
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	212
(1903年)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294
(1904年3月16日)	
上帝的信仰	325
(1906年1月)	

在法国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355
(1908 年 10 月)	
认识问题	361
(1910 年)	
报刊索引	383
人名索引	385

法国的阶级斗争

(1894年8月)

(一) 贵族和资产阶级

法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1830年起,法国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相互争夺权力的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家庭纠纷,而现在不同了,它具有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性质。

拿破仑的英雄史诗以滑铁卢失败而告终,法国贵族和资产者把这当作挽救命运的胜利,对此大加庆贺。这时已经丧失了封建特权 and 变得政治影响不大的贵族随着路易十八的上台而重新获得了政权。当然,它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单独进行统治,而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分享国家的领导权。帝国时期已经停止的政治斗争在议会形式下重新开始了。贵族力图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秩序,而资产阶级方面用尽一切力量排挤贵族,以独占政权。随着1830年的革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宣告结束。1830年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局势的绝对主宰。贵族最终被击败了,不仅如此,它最终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它的所有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再也分不开了。从前彼此敌对的两个阶级的成员化干戈为玉帛,联合成友好的同盟,以便通过投机和金融诈骗来剥削工人阶级,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

(二)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 之间的政治斗争

从1830年起,实际上再也谈不上政治阶级斗争了。政权始终掌握在资本家阶级一个阶级的手里:路易-菲力浦时期,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期和1871年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情况都是如此。政治斗争一直只是同一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直到最近几年,还没有另外的阶级争夺这个阶级手中的权力。1830年之后,自由派声称,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当时是对的。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灭亡,而那些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时还处于形成状态,还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1848年6月和1871年3月先后两次爆发了威胁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大规模起义。这两次起义是被压迫阶级的猛烈反抗。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也可以说,它的行动是盲目的,本能的,是由于受到形势的逼迫。六月起义者和公社保卫者象古代的奴隶一样完全是为了暴动而暴动,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他们所提出的要求甚至同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六月战士发难,不是要求资本,而是要求**劳动权**。其实,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任何财产,正是为了把他们束缚在劳动上;资本家不是用奴隶主的鞭子,而是用饥饿来迫使工人为了可怜的一点工钱而进行最劳累、最沉重、对健康最有害和时间最长的劳动。成为巴黎主人的1871年公社保卫者对资本主义财产表现得非常崇敬。公社本来应当占领法兰西银行,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派人在银行大门口警卫,以保护资本家老爷的财宝。尽管如此,银行还是背叛了公社,向梯也尔提供了他供养围攻巴黎的士兵和宪兵所必需的数

百万费用。起义政府专门开了几次会议来讨论两个公告，一个是延期三个月支付期票，另一个是在三个月之内废除房租。1848年的资产阶级和1871年的凡尔赛分子谩骂、诽谤和攻击这两次无产阶级起义，硬说它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果这两次起义取得胜利，或者至少坚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末它们最终必然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那时它们不自觉地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资产阶级把六月和三月的起义者说成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在对这两个词的意义一无所知的公众心目中败坏他们的声誉。因此这是纯粹的诬蔑之词。但是这种诬蔑最终会成为实情。1848年起义者会要求得到资本，从而完成自己对劳动的要求，而1871年的公社保卫者必定会夺取起初受到公社保护的资本家财产。与此相似，中世纪的民间的异教徒是从批判教皇的宗教权力开始，结果攻击了教会的世俗领地和一般财产。他们虽然考虑的是灵魂和天堂的利益，却开始致力于肉体和人间的利益。所有曾经震荡过社会的人民运动，——无论是希腊和意大利国家的内战还是中世纪城市的流血斗争，宗教改革的斗争，还是近代的起义——都包含着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的问题。

曾经是巴黎两次起义的见证人并积极参加过在它们失败后进行的镇压的梯也尔先生能够两次宣布：“社会主义被消灭了”。因为即使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些起义的预想的和有意识的原因，那末看来它也必定会是这些起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不是人们预料的和追求的。

(三)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

实质上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六月起义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

动，虽然从1830年到1848年路易-菲利浦在位时期存在出色的和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宣传，甚至“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勃朗和一些最著名的改革家在1848年以前提出的并为他们的门徒所传播的社会理论既不符合他们希望改善其生活条件的工人阶级的需要，也不符合它的利益。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否定革命的传统。他们不满足于象已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那样单纯宣布一下，“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走得更远，谴责1789年的革命是狂热病的发作，因为它的流血斗争只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摆脱一切束缚，从而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他们从反动的观点出发批判现存关系，并且仿效教权派和贵族用中世纪来对抗现代社会。这使他们在工人的心目中成为可疑的人。虽然工人们也吃了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苦头，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贫困归罪于革命；他们以为，革命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是因为阴谋家歪曲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大革命本身是好事，而人类的贫困只有在人们决心实现一次新的1793年的情况下才能够消除。因此，他们开始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而倾向于那些为了通过革命途径建立共和制而搞密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路易-菲利浦在位时期的秘密团体从工人中间招募了大批积极成员。布朗基由此相信工人不信任社会主义者，这个事实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使他在帝国时期不再传播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并劝说自己的朋友不要从事社会主义宣传。

各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对革命的厌恶使得他们坚决拒绝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甚至谴责经济领域里的斗争。他们害怕一切激烈的宣传活动，如果说他们相互争论自己的社会药方的优点，那末他们在劝告工人不要考虑政治和不要举行罢工这一点上却是非常一致的。无政府主义鼻祖之一、现在被人奉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权

威的蒲鲁东，最初重复布里索的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使得善良的资产者惊骇万分。后来他却创造出一个天才的思想：号召工人罢工，但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为了降低他们的工资。他的这个逻辑是了不起的，不愧为最正统的官方政治经济学。因为提高工资必然会使物价上涨，所以工人作为消费者所损失的要比他作为生产者所得到的大两倍或三倍；相反，因为降低工资会使物价下跌，所以工人作为消费者所得的要比工人作为生产者所损失的大两倍或三倍。

社会主义改革家不懂得，他们伤害了工人的政治本能，并且在想要保障群众的未来的福利的口实下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当前的利益。他们对周围的现实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沉溺于自己的空想，并对称地安排自己的理想社会。他们不自觉地为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资本家一掌握政权，就竭力把政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只给那些拥有一定的、相当可观的收入的人选举权。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从事政治很满意，正象现在资本家对那些建议无产阶级放弃利用普选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感到称心如意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者不同意罢工也同样感到满意。取缔一切工人组织曾经是革命的最初的法令之一；从那时起，资产阶级严禁工人组织任何旨在提高工资或罢工的团体。据我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在1848年以前——至少在欧洲大陆——就懂得并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同样也懂得罢工的重要性，认为罢工是保卫工人的生存，使之免受他们的剥削者的压榨，组织无产阶级，使之同资本家阶级对抗和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

各个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们之所以不考虑工人的政治本能和他们的当前物质利益，是因为他们在改造社会的问题上对无产阶级不抱任何期望。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是畜群，资本家是它的牧

人。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呼吁书中诉诸一切社会阶层的有产者；他们力图让这些有产者相信，依靠他们的帮助就能够实现他们预言的奇迹。罗伯特·欧文的在亚琛召开王公和资本家的代表大会并向他们提出自己的未来社会的计划的主张同法国空想主义者的愿望和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傅立叶、圣西门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都鼓吹资本、才能和劳动的联合，即资本家、学者和艺术家以及工人的联合；可见，他们认为后者不论在才能上和资本上都是贫困的。他们千方百计地证明，有产者在改造社会中不会失掉任何东西，不会有任何强盗去侵占他们的资本，他们的利润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改革家似乎只是希望改善资产阶级社会，其目的是首先给资本家带来利益，其次附带也给工人带来利益。他们希望社会摆脱它的最激烈的对抗和不协调。但是他们期望消除的弊端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无法根除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必然结果，而它们的发展为改造社会作好了准备。社会主义者寻求社会和平并希望消除任何冲突的原因。

傅立叶、圣西门和其他改革家所招募的信徒几乎全是看不起普通工人的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的最有教养的阶层。除了少数例外，在他们周围还集合了一些认为社会对自己的贡献估价不足、重视不够和酬劳太少的有教养的人。这是一些精神上堕落的人，他们逐渐变得老练和成熟起来并成为大胆的企业家、奸滑的商人和不怕任何风险和丧失良心的投机家。例如，——只举这伙人之中的一个人为例——果丹先生在吉兹（埃纳省）按照傅立叶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法伦斯泰尔。他开办了一个搪瓷器皿厂，让大批工人住在一座宽敞的玻璃房顶的四角形宫殿周围的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除了住处，工人们在这里还得到一切消费品（肉类、布、食品杂货等等），可以上剧院看戏和参加音乐会，有子弟学校等。总之，

果丹先生关心工人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他的高明的傅立叶社会主义，还赢得了很大的利润。他得到了人类慈善家的声誉并作为百万富翁和欧洲名人离开人世。当然，不能让老师为他们的学生的行为负责。但是，为了使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能够吸引精明的投机者和剥削者，必须用对社会环境的尖锐批判和伟大空想主义者所预言的光辉灿烂的未来图景来掩盖资本主义理论，这些学生正是抓住这些理论，并用自己的未来的行为和活动，用自己经营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惊人的本领来阐明这些理论。

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当然只能给那些被正在发展的机械大生产的竞争挤垮了的手工业者以精神上的满足并使那些沽名钓誉的和不安分的资产阶级堕落分子的贪欲如愿以偿。相反，它不可能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它极端蔑视工人阶级的本能和需要，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改善无产阶级地位有实际意义的改革。1848年革命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们由于没有意识到本身的阶级利益，没有明确的目的和领袖而听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有了工人们从路易-菲力浦那里夺得的政权；他们听凭资产阶级把这个政权变成一个堡垒，以便从那里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他们宽宏大度地决定“用三个月的贫困来为共和国服务”，象乖孩子一样，天真地去听临时政府成员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进行的社会主义说教。大家知道，这个政府为了安抚资本家，按照银行家古德肖的建议提前支付了国债的利息，但是拖延向储蓄银行支付欠款，因为没有钱！1848年曾经欺骗过工人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首领路易·勃朗，1871年成为梯也尔摧毁巴黎和公社的同伴。

当三个月的贫困结束之后工人们向共和国要求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共和派用枪弹、混合委员会和流放来回答他们。1848年革命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领袖的名字被人

遗忘，他们的著作，除了个别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外，再也没有人看了。只有互助论这种反动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还继续存在。他们象船舶失事的遇难者紧紧抓住船的残骸一样，绝望地死抱住自己的经济独立性，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在他们的脚下动摇和瓦解。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借助于低息或无息的互助信贷来对抗大机械工业的强有力的竞争。他们象现在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向国家要求这种贷款。在德国，舒尔采-德里奇曾经希望通过信贷合作社向他们提供这种贷款。

(四)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虽然1848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已经分化成为无数的种类和亚种、学派和小学派，但是总的说来信奉者并不多。它没有在工人群众中扎根，只吸引了一些手工业者和资产者。因此，资本家阶级没有理由对这种社会主义感到惶恐；它把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看成是奇特的圣徒，无害的幻想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信奉者本身也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的怪人。他们装束稀奇古怪（例如，圣西门分子穿的衣服的扣子在背后，在穿衣服时好让同伴帮忙，借以证明联合的必要性），帽子特别大，留着大胡子等等。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期间，资产阶级政党继续互相争夺统治权，好象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者。六月起义使它们看到还存在着一种与空想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它们看来是一切怪物中最可怕的怪物。资本家象相信福音书一样相信一切报刊所散布的关于起义者的拙劣而又无耻的诽谤。报纸宣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分财产。资本家信以为真。个人主义的资产者千方百计想把一切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对他们来说，分财产——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曾经冒充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拿破仑亲王，现在为了拯救社会免遭共产主义之害而为资产阶级效劳。不懂得组织政党和启发工人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成了波拿巴主义野心家手中的政治工具，他利用这个工具推翻了共和国和建立了帝国，以“**维护秩序、家庭和财产**”。社会主义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给反动政党提供了武器，它们借此来阻碍政治发展和镇压无产阶级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帝国的最初几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原因是建立了动产信用公司、土地信用公司和其他现代信用机构，建设了铁路，农业有了发展等等。这个繁荣局面使人忘记了六月起义和这次起义给资产阶级人士带来的不安。那些还记得暴乱的人把它看成是由特殊原因引起的特殊事件，认为用不着担心它会重演。同样，社会主义也被人遗忘了，不再有人提起它。人们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怪物，就象路易-菲力浦当政初期资产阶级曾经热烈拥护的国民自卫军一样。

但是，拿破仑第三没有忘记，他是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政治表现登上王位的。当工商业萧条的年代来临的时候，动产信用公司的破产造成的大批银行倒闭使得资产阶级一切阶层的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共和派又抬起头来并向帝制展开了进攻。于是，拿破仑认为这是重新点燃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有利时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应当互相厮打；而政府可以作为兴高采烈的第三者坐山观虎斗和享受靠计谋获得的安宁。拿破仑出于这种打算恢复了从政变时起已经废止的集会权，但是只限于讨论经济问题的集会。警长必须禁止一切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这种限制的结果同他们预定的目的恰恰相反。拿破仑把政治变成禁果，反而引起公众的热烈兴趣。相反，公众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和漠不关心。而皇帝本来打算使经济问题成为公众注意中心，以便唆使工

人反对资本家，把共产主义和平分财产的“**赤色怪影**”召唤到惊恐的资产阶级的眼前。

工人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听说社会主义了，甚至连这个词的意义也不了解，可是“共和国”、“自由”等等字眼象响亮的号召在他们耳际鸣响。演说家们在集会上为了迎合听众的热烈兴趣，不去抨击企业主和资本，而是抨击政府，并且在演说中影射皇帝和皇后，有时直接攻击他们。演说家们不去描述经济上的被剥削者的贫困和公有财产的美好，反而浪漫主义地诉说政治压迫的可耻、自由的欢乐，共和国和革命的伟大。为了重新使政治生活平静下来，拿破仑决定再次禁止公共集会。但是已经晚了，——巨石已经往下滚动了。

从上个世纪的大革命以来——不算六月起义和1831年里昂暴动——第一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在此之前，参加政治斗争的只有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这一次工人们参加了运动，他们冲击帝国政府，为共和国而斗争。工人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共同行动。工人阶级遵循事实的逻辑进行活动，不自觉地遵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工人阶级的这第一次政治行动表明，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者的反政治策略是行不通的。无产阶级迫于形势所采取的行动使资本家更加确信，不再存在阶级了。他们陶醉于一种甜蜜的幻想：工人们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把有产者看成是自己的“天然的”领袖，并忘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马前卒。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不反对成立国际，相反，参加国际，企图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象马志尼一样把国际当作反对帝国的工具。而国际实际上证明自己是这样的工具。当茹尔·法夫尔和共和派领袖们向政府献殷勤，得到政府宠爱的时

候，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高傲地和轻蔑地驳回了皇帝的代表鲁艾^①的建议。他们明白，首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政治关系上实行变革，为了能够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地位，必须推翻帝国并建立共和国。

但是，当时人们能够提供给工人的社会主义还不是能够满足工人并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以互助论的形式，以蒲鲁东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动的理论中已经深入阐述过的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工人的面前。它以自由的名义公开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以及美国南方各州为了保持奴隶制而脱离联邦的权利。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如象瓦尔兰和马隆，都曾经是蒲鲁东的互助论者，他们在国际的一些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些反动和傲慢的言论。托伦、利穆津、舍马勒和其他蒲鲁东分子抱有特殊的野心，妄图领导国际的运动并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强加给国际，虽然他们甚至不能为工人所理解。他们总是以少数票反对共产主义提案。帝国的倒台使工人阶级感到措手不及，工人阶级还没有建立巩固的组织和缺乏明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它的奋斗目标除了建立共和国没有别的。被近年来的政治鼓动推到前台的少数工人和手工业者也缺乏社会主义信念。因此，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派象1848年把奥尔良派排挤掉一样平平稳稳地取代了波拿巴分子的地位。工人们，甚至国际会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870年9月4日，在法国只有一个在政治上起作用的阶级，这就是资本家阶级。

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固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却是六月起义的大规模的重演，它清楚地表明，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都

^① 欧仁·鲁艾(1814—188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历任部长、参议院议长，第二帝国垮台后逃离法国，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阶级斗争。凡尔赛成为资本家利益的体现者。在那里聚集着一切政党的代表，他们在事件面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此相反，公社的巴黎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现代阶级斗争以其最尖锐和最可怕的形式第二次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1848年的无产阶级起义曾经象雷电一样突然地和不祥地在地平线上闪亮一下便消失了，没有留下痕迹。在第二帝国时期，六月起义者象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一样被人完全遗忘了。而公社，虽然它只是巴黎人的一次起义，却震动了整个民族并使工人们确信，在巴黎城下进行了一场争取他们的最切身事业的斗争。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这种感受，而这个感受是无法磨灭的。正在发生的经济事件必定加深这种感受并教育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促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组织成为政党。

(五)工人阶级组织成政党

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使法国经济关系发生了变化。从1863年同英国缔结贸易协定时起缓慢发展的大机械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法国工业不得不解决一个困难的任务，它必须医治好战争给它的三分之一国土带来的创伤，它必须拿出钱来建立庞大的武装，建立庞大的军国主义组织，最后它必须填补由于割让1870年以前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阿尔萨斯而造成的空白。几年的工夫，它就解决了向它提出的任务。在全国各地工厂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它们消灭了小工业并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过去实际上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若干城市这个唯一有巩固的机械大工业基础的地区才有工业无产阶级。战后过了十年，在全法国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埋葬了空想社会主义，公社最后结束了蒲鲁东主义